

# 单位动员的效力与限度<sup>\*</sup>

## ——对我国城市居民“希望工程” 捐款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毕向阳 晋 军 马明洁 何江穗<sup>\*\*</sup>

提要:以对“希望工程 20 周年品牌影响力评估”调查数据的分析为基础,本文在多维度上研究了动员对于公众捐助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体制内外,动员对于个体捐助行为的作用有显著差异:体制内个体捐款次数相对较多,而体制外个体单次捐款额度较高。总的来看,体制内外捐助者捐款总额差异不显著。这种模式展示了后单位制时代大众动员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一方面,体制动员因素保持着显著的效力,但有其作用的限度;另一方面,社会自主性空间获得了初步成长,然而动员机制也发挥着一定效果。这构成当前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与社会背景。

关键词:单位动员 捐助行为 公益参与 希望工程

### 一、问题提出

自 1989 年启动以来的 20 年间,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管理和运作下,希望工程共募集资金 54 亿元,援建了 15400 多所希望小学,资助了 338 万名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

\* 首先感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对学术研究一向的开放态度,允许我们使用“希望工程 20 周年品牌影响力评估”项目的原始数据。其次,要感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希望工程评估课题组的全体成员,他(她)们是马明洁、李涛、韩妹、黄冲、肖舒楠、王聪聪、王海萍。我们还要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老师。本文可以看作孙老师在 1999 年主持的希望工程 10 周年“动员与参与”研究的延续,理论取向也得益于孙老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讨论。同时感谢《社会学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修改建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基金支持了数据分析以及论文写作。对于文中存在的问题,概由作者负责。

\*\* 本文四位作者的合作始于对“希望工程 20 周年品牌影响力评估”调查的数据分析。第一作者毕向阳主要负责数据分析部分及统稿。晋军和马明洁参与论文的讨论和修改。何江穗,作为本文的通讯作者,主要负责文献综述部分。对本文有任何评论和建议,请与通讯作者联系。

2009)。希望工程取得这样的业绩,与普通公众的大力襄助密不可分。从来源上看,社会公众的小额捐款是“希望工程捐款的主体”(康晓光,1997:18),而且很大比例都是通过参与集体捐款而实现的,这部分人构成“希望工程真正的群众基础”(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1999:88)。<sup>①</sup>自1998年,希望工程的实施机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劝募重心转向了企业法人,来自个人的捐款比例开始降低。尽管如此,在青基会2008年收到的国内捐款中,直接来自个人的捐款仍然占捐款总额的14.8%。<sup>②</sup>近年的数据也表明,虽然总体来看企业法人捐款是我国公益募捐的主要部分,但来自社会公众的捐款在捐款总额中也占相当比例。<sup>③</sup>

希望工程被认为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慈善公益项目”(杨团、葛道顺主编,2009:350)。<sup>④</sup>研究公众对希望工程的捐款行为,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公益<sup>⑤</sup>参与的理解,进而从大众动员的角度深化对转型时期单位制及国家—社会关系演变的认识。在1999年对希望工程10周年的研究(孙立平等,1999)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希望工程的大众动员与参与存在的一些特点。一方面,在大众动

- ① 社会公众参与主要通过以个人名义向希望工程直接捐款、通过有组织的集体募捐活动两种方式。根据康晓光(1997:18)的研究,截至1997年,希望工程接受个人捐款1.29亿元(占捐款总额的45.6%),单位捐款1.54亿元(占捐款总额的54.4%)。而且来自单位的捐款中有49.5%是单位组织的集体捐款,纯法人捐款占50.5%,也就是说总计只有捐款总额的26.9%属于纯法人捐款。
- 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8年度工作报告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9)显示,2008年中国青基会接受来自国内的捐款3.98亿元,其中来自自然人的捐款为0.59亿元。
- ③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9)发布的《2009年上半年全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上半年我国个人捐赠占全国各类捐赠总额的26.3%。由于汶川大地震,在2008年度我国的个人捐款比例甚至超过了企业捐款,占了捐款总额的54%。
- ④ 在我国,“公益”常与“慈善”混用,但也有研究者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区分。杨团指出(2009:3),公益意味着“国家或者社会为了整体的需要,超越地区或者集团的局部利益,指向非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也意味着公民在共同的、共识的领域和场景中关注公共事务,为增进共同的利益,推进社会公正、公平的发展而采取的集体性协调行动”。根据这一定义,公益活动的主办方和执行者既可以是自发的民间机构,也可以是政府的职能部门,而慈善则专指由民间机构自动发起的为公众谋福利的活动。慈善因此属公益的一部分,但并不等同于公益。更确切地说,慈善是民间公益。由于我国的不少基金会和公益团体都有政府背景,所以对于我国的相关问题与实践,行文中主要使用“公益”这一概念。
- ⑤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9)公众调查发现,62.6%的城市居民曾向希望工程捐过款,而且公众参加希望工程和参加其他公益项目之间有一定的重合度。这印证了希望工程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公益事业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影响力和群众基础。

员过程中,在采取社会化动员框架的同时,也大量使用或借用了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中的组织资源。我们将这种动员方式称为“准组织化动员”。另一方面,从参与情况来看,处于单位、组织压力之下,在集体捐款活动中个人选择相当有限,有时捐款甚至是直接从工资中扣钱。我们把这种参与称为“行政化参与”。

出于一直以来对希望工程的关注,我们对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希望工程 20 周年品牌影响力评估”的调查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secondary analysis),力图以量化研究的方式继续探讨如下几个在我们 1999 年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单位动员机制对个人捐款行为具有多大程度上的解释力?单位动员在体制内外是否存在模式差异?对社会大众的公益参与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影响?

## 二、研究回顾

欧美现代公益事业具有很长的历史,迄今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脉络。<sup>①</sup>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把欧美研究者对个人公益行为研究的关注重点分为行为动机、个体特质以及动员情境三个面向。比较而言,国内学界对公益行为的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这与公益事业在国内刚刚起步有很大关系。但国内研究者目前已有的研究汲取了欧美的研究成果,对相关研究的三个取向都有所呼应。

首先,在经济学、理性选择、社会交换论以及文化认同理论对捐助行为的解释范式中,多以对捐助动机的基本假定为出发点,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首先是“人们为什么要捐助?”在对捐助动机的经济学传统解释中,捐助首先是一种基于对个体成本—收益进行衡量的理性选择,而非道德实践。由于捐助行为与经济学关于人的自利性假设有冲突,经济学家不得不把利他主义也纳入效用最大化的框架(贝克尔,1995: 335 - 343)。捐助是一种“善良消费”(Steinberg, 1997)给捐助者带来收益,如

---

① 至 1980、1990 年代,已经形成有关慈善(charity)、公益(philanthropy)、捐助(charitable giving, donation)、志愿行为(volunteering)等相关问题域跨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传统。由于研究问题和对象的性质,本研究侧重于依照一定框架梳理有关个人捐助行为的理论脉络。不过由于相关理论实际上往往难以明确区分,文献回顾也兼及其他各类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

“声誉收益”(Harbaugh, 1998a)。<sup>①</sup>在宏观解释上,经济学将慈善公益视为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总供给的增加,创造出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收益(Jones & Posnett, 1993)。<sup>②</sup>然而,过多强调理性计算存在将复杂动机简单化的嫌疑,也无助于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慈善的公共物品理论也总是得到与经验事实不符的结论(尤其是对于匿名捐助者)。<sup>③</sup>

社会学中有关捐助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如 Frank, 1996)基本上与慈善经济学共享相同的假设和立场,尽管拓展了成本—收益概念的范围<sup>④</sup>,但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正如有评论者(Wilson, 2000)所总结的,所谓收益并不是解释人们做出公益行为的必要原因。理性选择解释的一个问题在于忽视了人们对慈善价值的认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文化认同的面向着重从道德规范、慈善文化等角度来解释人们的捐款动机与行为,比如宗教信仰对个人捐助行为的影响(Olson & Caddell, 1994; Gruber, 2004)。一些研究者在宏观层面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慈善传统进行了讨论(资中筠, 2003)。在国内对希望工程的研究(孙立平等, 1999; 何光喜, 2002)中,也强调了捐款人对希望工程的道德认同。<sup>⑤</sup>

从理性视角出发或者从文化规范入手来认识个体捐助动机,虽然看似在对待个体的基本立场上截然相反,但不同程度地都以一种普遍化、均质化的动机结构为基本假定,因而相对掩盖了个体间的区别。因此很难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受同一文化的影响,在相同的免税政策的刺激下,为什么不同个体捐助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

① 在此方面经济学家意见也并不一致。有研究者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折中,如安德烈尼(Andreoni, 1990)在其“非纯利他”模型中提出“温暖的光辉”(warm glow)的概念。

② 在经济学分析传统中,税收对捐助行为的影响构成实证分析的重点(如 Steinberg, 1990; Randolph, 1995; Auten et al., 2002),可参见斯科凯特(Schokkaert, 2006: 146 - 152)、安德烈尼(Andreoni, 2006: 1231 - 1249)的综述。目前我国也出台了捐款免税的有关法规,但相关实证研究甚少。有研究者(刘能, 2004; 郭健, 2009)调查我国个人捐助行为发现,目前税收激励的政策效应并不明显。捐助人、公众对捐款免税政策所知甚少。

③ 所谓“慈善的公共物品理论”建立在公共假设、效用最大化和纳什均衡的假定之上。有经济学家(Sugden, 1982)指出该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相去甚远。无论抛弃其中哪一个假设,都无以为继。

④ 哈佛朋尼(Halfpenny, 1999)通过对经济学和社会学有关个体捐助的研究综述发现,理性选择社会学在若干方面构成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补充,不过定性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发现则与经济学套路相矛盾。

⑤ 为了克服经济人自利模式存在的问题,有经济学家在解释慈善行为时转向了道德选择理论(Laffont, 1975; Sen, 1977; Sugden, 1982)。

当然,不同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抽象假定,也有一些经验研究将重点置于对捐助动机的具体测量。比如帕纳斯(Panas, 2005)通过对捐助者的深入访谈发现,人们的捐助行为绝非单一原因。<sup>①</sup>有经济学研究者(Schokkaert, 2006)也指出,捐助背后的动机包括了物质性自利、互惠、道德规范、纯利他和同情等不同的类型,实际中更为复杂,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经济学家笼统地将其作为既定的、外生的偏好显然存在很大局限。一些研究区分了捐助动机的若干维度、捐助模式的若干类型(如 Mixer, 1993; Schaff & Schaff, 1999; Prince & File, 1994)。在此方面,不同的研究风格各异,结果差异也很大,这一现象本身足以体现出捐助动机的复杂性。威尔逊(Wilson, 2000)在对志愿行为研究的综述中指出,志愿行为有很多类型,每种都受到不同的价值的刺激,高度概括化的价值取向无法应对复杂的变异;不同群体之间价值取向也存在很大差异,以价值取向预测志愿行为十分困难。<sup>②</sup>

因此,在对个体捐助研究的另一个面向中,研究者重点关注了捐助者的社会背景或外在特征,比如家庭收入、婚姻状态、个体成员资格等。在此方面,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集中于:什么样的人倾向于捐助?为了回答这类问题,学者们对捐助人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Schervish & Havens, 1997; Mesch et al., 2006)。虽然不同研究的具体结论存在一定分歧,但大体上肯定了年龄、种族、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等因素对捐助行为的显著作用。<sup>③</sup>斯科凯特(Schokkaert, 2006: 158)回顾已有研究发现,社会人口变量对于解释捐助行为具有显著性,且不同研究结论高度一致:概括来说,老人和受

① 帕纳斯(Panas, 2005: 29-36)在访谈中发现,实际情况经常是捐赠者本人也无法精确表述自己的首要动机。但确定无疑的是,人们并不因为某些组织需要而捐赠。他认为多数人的捐赠并非理性,相反是责任感、宗教信仰、恻隐之心等等,有的则出于习惯,税收只是次要的刺激因素。不过实际中相关经验研究大都包含对动机的测量,将其作为分析的控制变量(如 Michaud, 1993; Schervish & Havens, 1997; Drollinger, 1997)。

② 仅诉诸价值取向的解释也涉及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Schokkaert, 2006)所指出的,以主观数据解释存在虚假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捐助行为的信息和态度都使用问卷采集自同一批被访者的时候。最近兴起的生物经济学(Neuroeconomic),试图借助认知生物科学的技术手段测量捐助动机(参见 Mayr et al., 2009)。相关研究放弃了孤立的理性自利主义偏好的假定,而强调涉他动机(other-regarding motivations)(参见 Yokum & Rossi, 2009),验证了人类决策行为中社会与情感因素的影响(参见 Delgado & Dilmore, 2008)。

③ 具体可参见威尔逊(Wilson, 2000)、贝克和维普金(Bekker & Wiepking, 2007)对相关背景变量的综述。

教育程度高的人捐助得更多。<sup>①</sup>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变量不能简单视为控制变量,它们的显著性结果有着另外一层意义。正如斯科凯特(Schokkaert, 2006: 158)所指出的,这暗示着社会依存性(social interdependencies)的客观存在。依据曼斯基(Manski, 1993)的说法,此即所谓关联效应(correlated effects):处于相同群体中的个体行为类似,因为他们有相同的个体特征或者面对着类似的制度环境。<sup>②</sup>

我国学者在公益捐助行为的量化研究中当然也包括此类变量。不过,对希望工程捐款人的研究(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 1999)发现,城市居民中希望工程的捐款人与城市居民整体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等,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样的结果似乎暗示,在我国特定体制背景下存在着驱动公众公益行为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因素。

其实,欧美学界也早有研究者(McAdam & Paulsen, 1993)指出,有能力或潜力捐助与决定捐助是两回事。对个人捐助行为的研究,不能只关注个人的捐助能力或背景特征,还要关注个人捐助行为的发生机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捐助研究中的另一个面向——对捐助行为所处情境脉络的强调——愈发受到重视。

与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理论将社会公众视作孤立的个体不同,在这一关系主义的取向中,个体嵌入于现实的社会群体或关系网络中,突破了对捐助者拥有资源多寡、个体理性动机和背景特征的过分强调。<sup>③</sup>在国外对劝募的研究中,早有学者(Howe, 1985)指出,在团体中对募捐进行讨论能促进个人的募捐行为。索科罗斯基(Sokolowski, 1996)发现,与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的社会纽带是影响慈善捐助的显著变量。在公共物品供给的试验研究中,戴伊克等(Dijk et al., 2002)发现了社会纽带存在的证据。舍维什和哈文思(Schervish & Havens, 1997)用

① 正如弗里曼(Freeman, 1997)的分析所表明的,事实上并非时间更具价值的高文化程度人士拒绝志愿行为的要求;相反,受教育程度、工资水平等越高,越有可能响应志愿行为的要求。这个结果表明,纯物质性利己主义的解释存在问题。

② 安德烈尼和斯考兹(Andreoni & Scholz, 1998)由“社会参考空间”(social reference space)概念出发,将与家户具有类似特征(年龄、教育、职业、居住地等)的参考群体(reference group)的平均捐助水平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尽管不是很大,但发现了聚集效应的存在。

③ 以人类学“互惠”的概念为基础发展对慈善捐助行为的理解(如 Sugden, 1984; Kolm, 2006)或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包括信任和网络的维度)来考察(如 Wang & Graddy, 2008),都可以归入这样一个脉络。经济学研究(如 Andreoni & Scholz, 1998)中归之为“偏好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 of preferences)问题。

“去教堂的频繁程度”、“慈善组织的成员资格”一类的指标来测量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组织关联的紧密程度,纳入分析模型并验证了其作用。采用曼斯基(Manski,1993)的概念,斯科凯特(Schokkaert,2006:158)将内外两个方向的社会联系概括为情境性互动(contextual/exogenous interactions)和内生性互动(endogenous interactions)<sup>①</sup>:个体捐助倾向随着所在群体的外在特征(如地域)和平均捐助水平而变化。

其次是对动员过程在个体捐助行为中作用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对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指标、甚至社会关系强度的讨论涉及的还只是个体捐助行为的潜在可能性。对捐助行为动员过程的研究则面对着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捐助的可能性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捐助行为的?沿着这样的思路,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捐助行为的发生机制。正如有研究者(Michaud,1993)的所揭示的,有无遇到募捐动员对个人的捐助行为影响显著。<sup>②</sup>弗里曼(Freeman,1997)则指出,情况往往是人们在被问及时说志愿行为是出于道德义务,但他们之所以如此只是其他人(主要是家人、朋友、同事等)让他们这样做。<sup>③</sup>

需要强调的是,实际中这两个方面紧密相关。个人所处的关系脉络并非单纯作为背景而存在,它们通常意味着与参与渠道的距离和被动员的可能性。<sup>④</sup>一些研究(Schervish & Havens,1997; Wang & Graddy,2008)表明,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增加了个体被劝募的可能性,为个体捐助提供了渠道。弗雷和梅尔(Frey & Meier,2004)指出,近来亲社会行为的理论集中于“有条件的合作”(condition-

① 就具有“社会乘数”(social multipliers)效应的内生性社会互动学界已达成基本共识,但方法上如何识别仍较为棘手。此方面较新进展可参见 Soetevent & Kooreman,2007。

② 有研究者(Long,1976)还发现,个体间的劝募相比于广告、邮件等动员形式有助于增加捐助,尤其是朋友之间要强于陌生人;某些工作场所关系相比于陌生人也有效。实验经济学对此问题的研究得出了矛盾的结果(参见 Andreoni & Croson,2008)。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修订原有的框架。如安德烈尼和克罗森(Andreoni & Croson,2008)指出的,方向之一是发展有关互惠、匿名和道德的行为理论。

③ 近来经济学有关捐助的研究以行为经济学为主,多用实验方法,获得了一些更经验化的结论,肯定了社会机制的显著作用。具体的机制涉及社会信息(Isaac & Walker,1988; Shang & Croson,2009)、社会比较(Frey & Meier,2004)、社会压力(Long,1976; Freeman,1997; Keating et al.,1981)、社会学习(Chaudhuri, et al.,2006)、社会影响(Carman,2004)等。

④ 构成社会运动核心问题的动员理论有助于解释公益行为的动员过程。正如有研究者(Wilson,2000)指出的,尽管对公益事业参与的研究与对社会运动参与的研究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有许多共同点。

al cooperation) 概念:当他人捐助时人们也更愿意捐助(可能归因于多种动机因素,如遵从、社会规范或互惠等);当提供了其他许多人捐助的信息时,会出现更高的捐助率。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在对个人捐助行为的研究中,回答“捐助者是如何成为捐助者的”问题,需要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组织的联系与相应的动员结构联系起来,以考察外在制度与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个体行为模式。<sup>①</sup>

总体而言,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对动员结构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人际关系、邻里氛围、宗教组织成员资格等因素;<sup>②</sup>而国内对个人捐助行为的研究中,由于制度背景的差异,组织动员往往是关注的重点,尤其突出个体与国家行政力量之间的纵向关系。1997年希望工程10周年评估调查(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1999:25)中发现,有组织的集资捐款是希望工程捐赠者参与希望工程的主要途径,这些活动又多在捐款人工作单位中进行。

那么工作单位中的募捐动员对于人们的捐助行为具体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在1999年对希望工程的大众动员与参与的研究(孙立平等,1999)中,我们发现在“准组织化动员”方式下,捐款者个人的捐款行为往往是面对组织压力的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行政强制。不过在这项研究中,经验资料主要是对希望工程的各级实施机构(从青基金会到国有企业的团组织)的访谈,未能涉及那些受行政力量控制较弱的外企和私企员工以及自雇佣者对希望工程的参与。此外由于属于定性研究,结论只是提供了对希望工程动员与参与机制的一种理解(interpretation),并不是一种普遍化的解释(explanation)。

在这种意义上,何光喜(2002)的量化研究补充了我们研究的不足。他利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2001年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城市公民公益意识和公益行为调查数据,对个体捐助行为进行了多

---

① 正如莱迪亚德(Ledyard,1995)综述以试验方法进行的有关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相关研究时所总结的,假之以不同的、特定的环境,至少90%的个体会变成自利的纳什均衡博弈的玩家(Nash players);也几乎所有个体都能为了集体利益而捐献。这实际上充分肯定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② 关于工作组织在劝募中的作用,国外的实证研究不多。基汀等(Keating et al.,1981)有关联合之路劝募协会(United Way)的研究算一例。联合之路采取了一些基于工作场合的劝募策略。作者使用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明,社会压力(如工厂车间追求“100%捐助率”形成的地方性的情境压力)对于是否捐助以及捐助多少都有正向的影响。卡门(Carman,2004)强调了“工作场合”(具体以联合之路的地方组织或者邮政信箱编号测量)的作用,落脚点则是同伴效应(peer effect),也涉及以年龄、收入变量区分的子群体。

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显著影响个体是否做出慈善捐助行为的因素中包括工作单位类型及是否经常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等变量,而个体性客观因素包括经济状况对个人是否捐助没有影响。何光喜指出,有组织的募捐活动是影响个人是否捐助的首位因素,因此,我国城市居民个人捐助行为属于在组织动员下的自愿参与。他用“被动的自愿”这一概念来描述我国个人捐助行为的这一特点。

不过,何光喜在这篇文章中只分析了个人的捐助行为是否发生及相关因素。然而,个体捐助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捐助与否只是其中一个维度。除此之外,捐助的强度(包括次数和额度等)也必须强调。针对捐助行为的不少经验研究(如 Jones & Posnett, 1991; Drollinger, 1997; Smith et al., 1995)都同时关注了是否捐助和捐助水平的维度。结果表明,以捐助行为是否发生和关注捐助强度两个不同维度做因变量模型所得结论往往有较大差异。

国内其他一些研究涉及了个体公益行为的其他维度。康晓光等(1997:399)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那些以个人名义直接捐款的捐款人给希望工程的捐款额度,但是该研究并未涉及单位和动员的因素。刘能(2004)的研究报告了城市普通公众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意愿和行为的基本状况,并构造了“捐赠敏感度”的综合指标,然而模型中也缺乏能体现体制或动员因素的变量。<sup>①</sup>

捐助行为的复杂性意味着充分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综合的视角,纳入更多层面和角度的变量。不过既然任何研究都有自己的立场并有所侧重,本文也不计划对此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而是继续推进上述相关脉络的研究,在尽量控制相关因素的情况下,把重点放在单位动员与个体捐助行为之间的关系上。

### 三、研究思路与假设

基于上述认识,分析单位体制和动员对于个体捐助行为的影响,需

---

① 在刘能(2004)的模型中,最终结果中只有个体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显著。“捐赠敏感度”指标尽管综合,但是混杂了诸多维度,反而会遮蔽某些信息,实际上更接近于对个体公益态度和行为一般取向的测量。

要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动员和参与的关系。捐助行为涉及复杂的动机结构,尽管经验研究中纯自利性假设难以充分解释实际中的公益行为,但并不能否定个体的能动性。实际的行为模式总是制度设置与个体理性交互作用的结果。<sup>①</sup>可以设想,这一点应于不同背景下个体参与模式差异的比较中有所呈现。<sup>②</sup>根据伯恩斯坦(Bernstein, 1967)的分类,中国社会的动员是一种“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而非命令或强制式。这提醒我们必须对行动主体的参与过程给予特别的关照。<sup>③</sup>对于参与的类型,可以借鉴亨廷顿和尼尔森(Huntington & Nelson, 1976: 7-10)对政治参与的划分,将参与区分为“动员性参与”(mobilized participation)和“自主性参与”(autonomous participation)。二者之间的对比关系,提供了一个考察转型时期公益参与特质和变迁的结构性视角。

其次,体制内外的区分。城市中,单位作为再分配体制的组织基础(Walder, 1986;路风, 1989;李猛等, 1996;李汉林、李路路, 1999),不仅构成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也为大众动员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单位制下,在国家发动的大众动员面前,个体缺乏退出权(孙立平等, 1999: 277-279)。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单位制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组织动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若以体制内外区分单位类型,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可能在于,与体制外相比,体制内的单位中,由于路径依赖性,动员往往任务化、常规化。对于公益行为而言,在这样的组织情境和动员结构下,一方面固然提高了参与的普遍性,但也会让个体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导致个体一定的捐助潜力被分解,对劝募动员的敏感性降低。<sup>④</sup>

① 当然,现实中的个体理性与原子化的、效用最大化的假定情况相去甚远,而更接近于一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受情境约束的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Nee, 1998)。由这个方面来理解,捐助行为可视为一种在制度规范、共享信仰、社会网络等因素影响下利益驱动的个体行为。对此加以检验,有赖于更为综合性的研究。

② 如哈勃(Harbaugh, 1998a, 1998b)以社会声望概念为工具,分析了为什么报告人们的捐助数量有助于提高捐助水平,以及人们倾向于按照某个捐助等级最低标准进行捐助。

③ 正如亨廷顿和尼尔森(Huntington & Nelson, 1976: 7-10)指出的,实际中很难在二者之间划出明确界限。不过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为的是纠正以往研究只关注自主参与的一面。在他们的研究中,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重要议题。

④ 当然实际中捐助不单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可能混合了多种动力机制,如群体压力、社会声望等,并涉及一系列具体的组织动员技术,如“领导带头、他人尾随”的科层化模式。不过,受制于研究问题“是否受到动员”相对而言属于一个情境性因素)和数据资料(非包含分层或重测的多水平结构)的性质,本研究关注点为动员对个体公益参与的效果,而非具体的内部机制。

第三,捐助行为的多维性。如前所述,捐助是一个多面向的行为,不仅包括是否捐助、捐助次数,还有捐助水平。不同体制和动员情境下个体背景差异与策略性行为必然表现为在不同维度上捐助行为的多样性。

基于上述认识,结合有关研究的已有结论,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体制背景与动员机会具有高度关联性,不同体制背景和组织情境动员强度不同。H1:相对于体制外,体制内的个体受动员捐助的几率更高。

组织动员创造出特定的情境压力,有助于提高参与率,增加捐助次数。结合H1可以推论,由于受到动员的几率更大,H2.1:体制内个体相对于体制外更可能捐助,捐助次数更多。

相比于体制背景,组织动员是一个更直接的影响变量。<sup>①</sup>因此,H2.2:无论体制内外,动员显著增加了捐助次数。然而,由于体制内单位捐助活动任务化、常规化,个体参与更可能呈现固定的模式化特征,H2.2.1:无论是否属于受动员的情况,体制内个体捐助次数没有显著差异;相反,H2.2.2:如果属于被动员,体制外个体在捐助次数上显著增加。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体制外个体对动员具有更强的弹性。

如果收入高低对于捐助可能性没有显著关系的已有研究发现(Smith et al., 1995;何光喜, 2002)具有普遍意义,那么不妨由此进一步推论,H3.1:收入水平对于个体捐助次数没有显著影响。这体现出所谓“重在参与”的模式特征。

但是,由于捐助额度受制于捐助能力(Jones & Posnett, 1991;康晓光等, 1997),因此,H3.2:收入水平对于个体的捐助额度存在显著影响。在捐赠次数一定的情况下,单次捐助额度更主要取决于收入因素,且非单位动员情况下个体捐助更可能出于自愿,所以控制收入水平因

① 在何光喜(2002:31)的统计模型中,控制了单位是否经常募捐因素后,单位类型之间的差异基本消失。只有政府机构与无单位的参照类相比仍然保持显著性。因此他认为,单位类型对是否捐赠的影响主要通过单位募捐起作用,是否捐赠关键不在于个体身份,而在于是否面临经常性募捐。然而单位类型变量的意义在于,不同类型的单位开展募捐活动的经常性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组织情境存在差异会令动员机制所起作用产生变化。考虑实际意义,在模型中加入单位类型和单位是否经常募捐的交互项有助于识别该效应。另外,从单位是否经常募捐推论个体是否自愿捐助存在层次谬误的风险。如果区分“动员性参与”和“自主性参与”(Huntington & Nelson, 1976: 7-10),那么上述方式难以辨别个体行为本身属于哪一种类型以及群体中不同捐助类型各占多大比例。

素 ,H4:体制外个体单次捐助额度较之于体制内更高。

由上述假设可进一步推论,在捐助能力一定的情况下,H5.1:随着捐助次数增加,体制内个体捐助单次额度减少;然而,H5.2:无论是否属于受动员的情况,体制外个体单次捐助额度没有显著差异。<sup>①</sup>

总的来看,由于体制内捐助次数多,而体制外单次捐助额度高,因此有可能出现体制内外个体捐助总额相当的情况,即,H6:体制内外个体额度总额没有显著差异。

下面以“希望工程20周年品牌影响力评估”公众和捐助人调查中涉及捐款问题的数据为基础,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

####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了评估希望工程20年来的社会影响力和新的进展状况,受中国青基会委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采取抽样调查方式,对城市公众、捐赠人、捐赠单位、受助人、希望小学校长和希望工程受助县团县委书记等六大群体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城市公众调查的总体为全国城市公众(18-64岁),调查采用分层、PPS抽样,使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2009年9月1-15日,共完成了对20个城市市民的问卷调查,获得2048个近似自加权的样本。通过中青报社调中心CATI系统,同时辅以在线调查,对中国青基会及各省级青基会提供的捐助人手机、固定电话号码进行了调查,共获有效样本1519个。<sup>②</sup>

在公众和捐助人调查的问卷中,设置了询问捐助原因的题目(多选),其中包括“公司(单位)组织的捐赠,不便不捐”的选项。在有希望工程捐助经历的公众中,选择了该项的比例为27.2%。至少这部分个

---

① 如前文所述,有研究(如 Keating et al., 1981)肯定了劝募对与捐助行为的正面影响,但也有人(Schervish & Havens, 1997)发现直接的劝募方式对于捐助多少会产生负面效果。解释这种效果的差异,一方面区分捐助的不同维度,另外也要考虑动员方式之间的差异以及具体的组织情境。

② 在捐助者问卷中,捐款次数采取的是定序测度水平,而针对公众的调查问卷中未涉及捐款额度的信息,因此只能分别使用公众数据和捐助者数据研究捐款次数和捐款水平。另在年龄、捐款次数两个关键变量上,两份问卷并未采取统一的测量尺度。为保持变量的有效信息,分析时尽量在较高层次的测量水平上使用变量。

体可认定属于“动员性捐助”的类型。<sup>①</sup> 鉴于即使通过单位组织渠道同样有主动和被动的不同情况存在(且相当比例个体并非通过集体形式捐助) 不论采取单位代扣、有人负责登记还是设置募捐箱的形式,就个体而言,主观认定更能准确反映本人捐助行为究竟属于自愿还是受到动员。因此本研究以这个选项作为区别被访者捐助行为类型的标志。<sup>②</sup>

从对体制内外在公益参与模式上具有差异的假设出发,本文根据数据中的职业变量区分了被访者的体制身份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类型。具体操作中,根据问卷中关于被访者职业类型变量,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学校及科研机构、军人武警等行业类型归为“体制内”;将社会组织、外企、合资企业、民企、集体、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行业类型归为“体制外”。<sup>③</sup>正如假设 H1 所述,从公众数据来看,体制内外和捐助是否属于组织动员之间有显著的关系( $p < 0.000$ )。简单的交互分析显示,捐助属于动员性参与,体制内比体制外高 22.9%,发生比率(Odds Ratio)为 4.35。<sup>④</sup>

为了更好地分析体制身份和组织动员的交互作用,将二者交互生

- 
- ① 这个比例与康晓光等(1997:15)1997年对个人捐赠者邮寄问卷调查中主动捐款率 68.4%的结果较为一致。不过该研究将通过单位活动的个人捐款均定义为非主动捐款。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1999:100)的调查直接询问“您对希望工程的捐款是否出于自愿”结果是 97.8%的个人捐赠者(定义为以个人名义捐款并留下姓名和联系地址的捐赠人)回答“是自愿”,0.6%说“不是自愿”,1.6%表示“说不清”。集体捐赠者(定义为多个个人集资、由联系人统一把捐款交到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的捐赠人集体)中相应比例分别为 96.4%、0.4%和 3.2%。由于涉及价值规范的问题,直接询问偏差较大。在希望工程 20 周年评估调查中,为了解捐助目的而设置的多选题将多种表述放在一起,客观上起到了“鱼目混珠”的作用,有助于降低敏感性,因此更有可能得到接近被访者真实意愿的结果。相应地,在捐助者调查中自我认定属于被动员的比例为 5.8%。由于公众调查属匿名、随机抽样、非面访,而捐助者样本系从署名捐助名单中抽取所得,仅针对捐款次数 1 次及以上情况且不包括匿名捐助者,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公众调查所获结果相对更为可信。
  - ② 虽然原则上该问题只是针对最近一次捐款所设,但由于被访者所处体制背景和一般行为取向相对固定,且大多数个体捐助集中在较少的次数,因此这个题项基本上能够反映捐助行为的持续性特征,表述上也符合“准组织化动员”和“行政化参与”概念的意涵。较之前述四城市公民公益意识和公益行为调查中“单位是否经常募捐”的问题,这个问法更贴近个体层面,在由于数据限制无法处理因个体嵌套于不同单位而出现的相关效应的情况下也较为适合。
  - ③ 其他行业类型统统归入“其他”,不计入统计。经此处理后,在公众调查中,体制内外比例分别为 43.1%和 57.9%;在捐助者调查中,比例则分别为 52.8%和 47.2%。
  - ④ 目前尚无理由认为出现这一结果是由于在相关问题上个体对体制内外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因此不失现实性。若假定一般公益意识及其他相关因素在体制内外个体中分布大体是随机的,那么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就在于体制因素所营造的动员情境存在差异。

成四种体制—动员类型:体制外非单位动员、体制内非单位动员、体制外单位动员、体制内单位动员。四种类型分别占总体的 51.1%、28.8%、5.8% 和 14.3%。<sup>①</sup>

由于数据收集方式的限制,问卷中未包含测量一般性公益意识和态度的量表,不过设置了询问被访者是否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的多选题,如是否“帮助福利院的老人或孩子”、“支教支农”、“参加志愿服务”、“向灾区捐款捐物”,是否向“春蕾计划”、“母亲水窖”捐款,等等。还有问及今后最有可能捐赠的机构的题目。个体就捐助行为“是否属于动员”的回答混合了一定的主观动机成分,与一般性捐助倾向存在一定相关。由于目前条件下难以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本文将这些题项分别加总,作为难以观测的个体一般性公益意识和行为测度的代理变量(proxy variable)纳入统计模型,<sup>②</sup>从而尽量控制由于遗漏此方面因素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sup>③</sup>

## 五、主要发现

### (一) 捐款次数

为了分析捐款次数(包括0次)<sup>④</sup>,构建零膨胀负二项回归(Zero-

- 
- ① 在捐助者调查中,这些类型的比例构成与此有较大差异。可想而知,由于样本选择及访问方式,在捐助者数据中被访者回答捐助属于单位动员的比例相对要低。鉴于这个问题上公众调查样本代表性更佳,在对捐助者捐款额度数据的分析中,根据公众数据调查所得类型构成比例对捐助者数据进行了加权调整。
  - ② 由于直接对动机或偏好进行测量十分困难,经验性研究中有学者借助外显的行为变量。如史密斯等(Smith et al., 1995)在模型中纳入“利他经历”(altruistic history),操作化为是否曾为慈善组织做义工或捐款,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显著。
  - ③ 捐助者调查问卷中没有一般公益活动参与情况的问题,因此分析时代之以捐助动机的相关题项。此外,在对公众(捐款次数大于0)和捐助者捐款额度的分析模型中,同时控制了捐助动机因素的若干题项。由于问及被访者捐助动机的多选题各题项属于二分变量,不便于进行因子分析,且部分选项测量的是同一个维度,所以分别挑选了一些选择比例较大、能够从不同维度反映捐助动机的选项作为控制变量单独使用。
  - ④ 根据公众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在知道希望工程的城市居民中,将近70%的人表示捐过款。众数为2次,中位数4次。71.8%的人捐款次数在5次及以下。从被访者汇报的捐助次数的分布来看,不排除存在由于跨度较长记忆模糊或数字偏好导致的堆积问题,但从模型拟合结果来看基本得以克服。

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模型。<sup>①</sup>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属于一类混合模型,由一个负二项分布和一个离散零分布组成:

$$\begin{cases} Pr(y_i = 0 | x_i, z_i) = \psi_i + (1 - \psi_i)(1 - \alpha\mu_i)^{-\alpha^{-1}} \\ Pr(y_i | x_i) = (1 - \psi_i) \frac{\Gamma(y_i + \alpha^{-1})}{y_i! \Gamma(\alpha^{-1})} \left(\frac{\alpha^{-1}}{\alpha^{-1} + \mu_i}\right)^{\alpha^{-1}} \\ \left(\frac{\mu_i}{\alpha^{-1} + \mu_i}\right)^{y_i} \quad y_i = 1, 2, 3, \dots \end{cases}$$

其中,  $\mu_i = \exp(x_i\beta)$ ,  $\Gamma$  为 gamma 分布函数,  $\alpha$  为过离散参数,  $\psi_i = \exp(z_i\gamma) / [1 + \exp(z_i\gamma)]$  ( $z_i$  为模型零膨胀部分变量)。

使用 Stata 软件 zinb 命令进行拟合,输出结果详见表 1。从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显著。根据似然比检验,体制—动员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模型不能忽略这些因素。考察输出结果,并使用 Wald 检验对有关系数线性假设进行检验,具体结论如下。

1. 根据 Inflate (Binary Equation) 部分输出结果,性别、年龄、体制内外、所在城市规模、一般捐助意向和公益行为等变量显著影响到个体是否属于捐款次数取正值为零概率的群体 (Always-0 Group)。收入水平、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等因素均不显著。

体制内公众比体制外公众不可能捐款的概率显著要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前者的发生比 (Odds) 为后者的 41.3% [ $100 \times (e^{-0.884})$ ]。

2. 根据 Main (Count Equation) 部分输出结果,在向希望工程捐款次数取正值具有非零概率的群体 (Not Always-0 Group) 中,控制其他因素不变,体制身份、单位动员显著影响捐款次数。

首先,(1) 在非单位动员的情况下,体制内外公众的捐款次数差异显著 ( $p = 0.021$ ),体制内公众捐款期望次数比体制外高 27.5% [ $100 \times$

① 捐款次数属于计数数据,非正态分布,具有过离散 (overdispersion) 且存在大量零值 (excess zeros) 的特点 (零值案例占样本的 34.8%),可以考虑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或门槛模型 (hurdle model)。从实际意义考虑,因变量存在两种类型的“0”值:1、完全没有机会向希望工程捐助的群体;2、有可能捐助但受机会结构等因素影响而未能捐助的群体 (Long & Freese, 2006: 394) 并根据实际拟合情况,本文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捐助次数的统计模型。与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零膨胀泊松回归相比, alpha 似然比检验和 Vuong 检验 ( $p < 0.000$ ) 支持使用该模型。

表 1 公众捐助希望工程次数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分析

	(1)		(2)	
	main	inflate	main	inflate
性别 = 男	-.008 (.079)	-.810 ** (.291)	.018 (.081)	-.810 ** (.369)
年龄 = 18 - 24 岁	-.365 + (.192)	-1.402 * (.653)	-.260 (.199)	-1.507 * (.748)
= 25 - 34 岁	-.233 (.162)	-1.424 * (.558)	-.176 (.166)	-1.575 * (.655)
= 35 - 44 岁	-.344 * (.161)	-.800 (.559)	-.326 * (.166)	-1.008 (.692)
= 45 - 54 岁	-.436 ** (.169)	-.262 (.539)	-.416 * (.173)	-.416 * (.609)
教育 = 高中、中专或技校	.098 (.119)	.400 (.343)	.053 (.123)	.438 (.391)
= 大专或者高职	.304 * (.124)	.095 (.443)	.205 (.131)	-.204 (.601)
= 大学本科及以上	.374 ** (.129)	.390 (.509)	.271 * (.136)	.360 (.604)
政治面貌 = 团员	-.000 (.116)	-.349 (.477)	-.349 (.126)	-.349 (.593)
=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036 (.219)	-.575 (.811)	.096 (.228)	-.317 (.951)
= 群众	-.064 (.100)	-.057 (.430)	.014 (.109)	.0273 (.539)
收入 = 无收入	.166 (.249)	.662 (.566)	.228 (.256)	.779 (.627)
= 1001 - 2000 元	-.082 (.125)	.207 (.365)	-.155 (.130)	.136 (.407)
= 2001 - 3000 元	.023 (.134)	-.424 (.478)	-.039 (.139)	-.039 (.552)
= 3001 - 4000 元	-.084 (.169)	.269 (.591)	-.142 (.174)	.270 (.687)
= 4001 - 7000 元	-.005 (.179)	-.352 (.639)	-.067 (.183)	-.067 (.748)
= 7000 元及以上	.039 (.247)	-.067 (.813)	.087 (.254)	.392 (.925)
一般公益行为	.063 * (.025)	-1.357 *** (.208)	.059 * (.027)	-1.596 *** (.368)
一般捐助意向	.010 (.013)	-.154 * (.061)	.013 (.014)	-.175 * (.0743)

续表 1

	(1)		(2)	
	main	inflate	main	inflate
城市 = 地级市	.112 (.118)	.967* (.429)	.183 (.126)	1.071* (.509)
= 县级市	.048 (.094)	1.034* (.465)	.172 (.110)	1.035+ (.551)
捐款人数多,受影响跟着大家捐 = 是	.215* (.094)		.209* (.096)	
符合自己捐助学生和教育的心愿 = 是	.015 (.110)		-.018 (.114)	
类型 = 体制内 - 非单位动员			.243* (.105)	
= 体制外 - 单位动员			.341* (.153)	
= 体制内 - 单位动员			.402** (.137)	
类型 = 体制内		-1.054** (.372)		-.884* (.438)
cons	1.207*** (.242)	3.621*** (.859)	.974*** (.265)	4.083*** (1.131)
lnalpha		-.371*** (.0969)		-.299** (.112)
N	1025		1025	
Log likelihood	-2173.4		-2167.7	
Chi <sup>2</sup> (df)	47.728 (23)**		59.069 (26)***	
AIC	4442.7		4437.4	
Cox-Snell R <sup>2</sup>	.285		.293	
LRT Chi <sup>2</sup> (df)			11.34 (3)*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p < 0.01, \*\*\*p < 0.001。

( $e^{-0.243} - 1$ ) ]。这一结果肯定了体制背景对于捐助行为显著的作用。比较而言,(2)在受单位动员的情况下,体制内外捐款次数没有显著差异( $p = 0.702$ )。<sup>①</sup>此结论进一步验证了何光喜(2002)对于捐助行为决定因素中动员相对于体制因素所具有的更直接的作用。

不过,体制背景与动员结构存在高度关联性。进一步来看,(3)对

① 参照类为体制外一单位动员。

于体制内的公众, 无论是否属于单位动员, 捐款次数没有显著差异 ( $p = 0.179$ )。<sup>①</sup> 相比之下, (4) 在体制外, 是否属于单位动员, 公众捐款次数差异显著 ( $p = 0.026$ ), 受到单位动员的公众捐款期望次数增加 40.7% [ $100 \times (e^{-0.341} - 1)$ ]。比较这两个结果, 实际上体现出体制背景对于个体捐助行为影响的恒常性, 或者说体制外个体捐助行为对于动员因素具有较高的“弹性”。

此外,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结果, 即(5) 对于个体是否捐助和捐款次数, 收入水平都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大众公益参与的普遍性。

## (二) 捐款水平

为了全面地分析捐款水平, 本研究区分了最近一次捐款额度和捐款总额度。<sup>②</sup> 对这两个变量的半对数多元回归分析<sup>③</sup> 结果表明,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体制性因素对于单次捐款额度和总额影响不同: 体制内的捐助者, 单次捐款额度显著低于体制外的捐助者; 然而, 在捐款总额上体制内外并不存在显著差异。<sup>④</sup>

进一步, 在捐助者捐款额度的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单位动员因素, 并使用 F 检验对有关系数线性假设进行检验, 有如下结果 (详见表 2)。

首先, 对于单次捐款额度, (1) 在体制外, 是否属于单位动员, 个体单次捐款额度差异不显著 ( $p = 0.614$ )。相比较而言, (2) 在体制内, 属于受单位动员的个体单次捐款额度显著低于非单位动员的情况 ( $p =$

① 参照类为体制内一非单位动员。

② 在对希望工程的最近一笔捐款中, 平均捐款金额为 2508 元, 中位数为 1 千元。捐款人对希望工程的累计捐赠金额平均值为 9711 元, 中位数为 4400 元。

③ 对于捐款水平, 为了避免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 宜纳入未捐款人数据。对于这类问题, 一般是在一定假设前提下, 采用 Tobit 模型或 Heckman 选择模型。如果相关假设不满足, 可采用两部分模型 (two-part model)。然而由于当前数据限制, 只能根据捐助人的调查数据分析捐款额度, 因此宜采取断尾 (truncated) 回归模型。不过从实际结果来看, 无论各变量显著性还是偏回归系数取值, 断尾回归与 OLS 回归输出十分相近, 加入体制—动员因素则几乎完全一致 (这某种程度上似乎表明, 由于体制—动员因素的作用, 此方面样本选择较为随机, 偏差不太严重)。因此为了方便直观, 这里仍根据 OLS 回归结果进行汇报。回归采取了半对数模型的形式, 捐款额度取了自然对数。同时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 排除了学化残差绝对值大于等于 2 的样本。

④ 如果仅区分体制内外, 以体制外为参照类, 对于最近一次捐款, 体制内偏回归系数为  $-0.419 (0.105)$  ( $p = 0.000$ ); 对于捐款总额, 体制内偏回归系数为  $-0.147 (0.147)$  ( $p = 0.319$ )。

0.001)。总的来看,(3) 无论是否属于受单位动员,体制外个体单次捐赠额度都显著高于体制内( $p = 0.000$ ;  $p = 0.023$ )。从数量来看,在属于非单位动员的情况下,体制内单次捐赠额度要比体制外低 32.6% [ $100 \times (e^{-0.395} - 1)$ ] 而在属于单位动员的情况下,与体制外相比体制内单次捐赠额度则低 62.9% [ $100 \times (e^{(-1.184) - (-.192)} - 1)$ ]。这个结果体现出单位动员在不同的体制情境中差异化的作用模式。(4) 就捐款的总额而言,四种类型之间差异均不显著。根据两对嵌套模型各自 F 检验结果,体制—动员变量对个体最近一次捐助额度联合显著( $p = 0.000$ ) 而对捐助总额不显著( $p = 0.291$ )。

此外,从模型输出结果可以看到,与上述收入水平与捐款次数之间的关系不同,就捐款水平而言,无论是单次捐款额度还是捐款总额,都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基本趋势是个体收入越高,捐款额度也越大。

上述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符合。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捐款次数和单次捐款额度呈现局部负向关系,捐款次数 2—5 次与捐款 1 次相比,捐助额度显著下降。为了更清楚地检验这种关系,根据研究假设,分别就四种体制—动员情境下捐款次数和捐款水平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从结果来看,(1) 在属于非单位动员的情况下,不论体制内外,捐款次数和最近一次捐款额度之间关系基本上不显著,相反收入水平更为显著;(2) 在属于单位动员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体制内,捐款次数与最近一次捐款额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收入水平因素不显著。这更直观地表明就个体层面而言,动员的效果更主要体现于次数而非额度方面。

相比之下,(3) 体制外的情况基本上介乎两者之间,捐款次数对最近一次捐款额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收入水平也有一定的显著性。这个结果基本上支持假设 H5.1,但与 H5.2 不符。从模型输出结果来看,如果属于受单位动员的情况,体制外个体单次捐款额度也有减少的趋势。不过在相对意义上,该趋势在体制内外的差异仍较为明显。<sup>①</sup>

① 去掉“体制外—单位动员”类型回归模型比“体制内—单位动员”类型回归模型多出来的变量,只保留捐款次数和收入水平,比较两个模型结果为:与捐赠 1 次的相比,“体制外—单位动员”类型捐赠 2 次—5 次、6 次—10 次、10 次以上“记不清了”几种情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686^{**}(0.825)$ 、 $-1.482^{+}(0.764)$ 、缺失、 $-2.175^{**}(0.764)$ ,而“体制内—单位动员”类型相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810^{***}(0.212)$ 、 $-0.825^{**}(0.251)$ 、 $-0.343(0.348)$  和  $-1.464^{***}(0.229)$ 。当然,由于“体制外—单位动员”类型样本较少,获得更可信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表 2 捐助人捐款额度半对数回归分析(未加权)<sup>①</sup>

	ln(最近一次捐款)		ln(捐款总额)	
	(1)	(2)	(1)	(2)
最近捐款年份	.032 (.027)	.039 (.027)	.077** (.028)	.078** (.028)
性别 = 男	.018 (.046)	.021 (.046)	.149** (.056)	.149** (.056)
捐款人数多 受影响跟着大家捐 = 是	-.856*** (.231)	.149** (.233)	-.927*** (.267)	-.927*** (.278)
符合自己捐助学生和教育的意愿 = 是	.197* (.094)	.173+ (.094)	.121 (.113)	.109 (.114)
捐助次数 = 2 次 - 5 次	-.368** (.125)	-.389** (.124)	.400** (.138)	.393** (.139)
= 6 次 - 10 次	-.354* (.172)	.393** (.170)	.853*** (.205)	.860*** (.205)
= 10 次以上	-.296 (.191)	-.286 (.189)	1.576*** (.222)	1.573*** (.223)
= 记不清了	-.493*** (.141)	-.506*** (.139)	.964*** (.178)	.942*** (.178)
教育 = 高中、中专或技校	-.234 (.255)	-.140 (.253)	-.422 (.292)	-.375 (.294)
= 大专或者高职	-.613** (.231)	-.493* (.230)	-.732** (.273)	-.697* (.275)
= 大学本科及以上	-.583* (.227)	-.362 (.230)	-.497+ (.265)	-.419 (.272)
年龄	.207*** (.035)	.207*** (.034)	.173*** (.035)	.172*** (.035)
年龄平方/100	-.197*** (.041)	-.193*** (.041)	-.157*** (.039)	-.155*** (.039)
政治面貌 = 团员	.164 (.165)	.063 (.165)	-.113 (.196)	-.158 (.200)
=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109 (.224)	-.064 (.224)	.534* (.269)	.447 (.276)
= 群众	.247* (.101)	.107 (.104)	.216+ (.119)	.161 (.130)

① 根据异方差检验(Breusch - Pagan / Cook-Weisberg)结果,各模型没有发现异方差问题。使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体制一动员各类型变量在因变量(最近一次捐款对数、捐款总额对数)25%、50%、75%分位数的偏回归系数取值与 OLS 结果相比虽有一定变化,但显著与否并未改变,经检验各分位回归系数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体制一动员因素在捐款额度不同水平上对其作用模式基本相同。

续表 2

	ln(最近一次捐款)		ln(捐款总额)	
	(1)	(2)	(1)	(2)
收入 = 无收入	1.982 *** (.534)	.161 (.530)	1.985 ** (.652)	1.922 ** (.654)
= 1001 - 2000 元	.989 ** (.366)	1.021 ** (.361)	2.102 *** (.498)	2.148 *** (.499)
= 2001 - 3000 元	1.417 *** (.356)	1.491 *** (.351)	2.153 *** (.486)	2.153 *** (.486)
= 3001 - 4000 元	1.770 *** (.362)	1.786 *** (.356)	2.269 *** (.497)	2.304 *** (.497)
= 4001 - 7000 元	2.389 *** (.358)	2.318 *** (.353)	2.892 *** (.489)	2.892 *** (.489)
= 7000 元及以上	3.062 *** (.358)	2.905 *** (.355)	3.621 *** (.487)	3.589 *** (.488)
类型 = 体制内 - 非单位动员		-.395 *** (.106)		-.128 (.133)
= 体制外 - 单位动员		-.192 (.381)		-.389 (.420)
= 体制内 - 单位动员		-1.184 *** (.248)		-.574 + (.328)
常数项	-64.245 (54.013)	-77.684 (53.351)	-153.675 ** (56.480)	-154.417 ** (56.488)
N	830	830	498	498
F (df)	24.9 (22, 807) ***	23.7 (25, 804) ***	23.7 (22, 475) ***	23.7 (25, 472) ***
R-Square	.405	.424	.496	.500
Adj. R-Square	.388	.407	.472	.473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总之 相对来讲 在体制外—非单位动员情况下 捐款行为更多地取决于个体因素 尤其是收入水平 其基本模式是捐款次数少 而单次捐赠额度高;而在相反的情况下 捐款行为更多地取决于体制—动员因素 个体性因素包括收入水平不显著。其参与模式的特点是次数多 而单次捐款额度低。个体的捐助行为之所以呈现这些模式特征 无疑与体制框架和动员情境的形塑作用有密切关系。

表3 区分情境捐助人单次捐款额度半对数回归分析(加权)<sup>①</sup>

	体制外 非单位动员	体制内 非单位动员	体制外 单位动员 <sup>②</sup>	体制内 单位动员
最近捐款年份	.067* (.034)	.003 (.055)		-.243** (.090)
性别 = 男	.103 (.070)	-.017 (.081)		-.334*** (.085)
捐款人数多 受影响跟着大家捐 = 是	-1.023** (.355)	-.637 (.501)		-.070 (.253)
符合自己捐助学生和教育的 心愿 = 是	.096 (.140)	.176 (.174)		-.271 (.179)
捐助次数 = 2 次 - 5 次	-.425* (.187)	-.323 (.222)	-2.686** (.825)	-.660* (.277)
= 6 次 - 10 次	-.186 (.263)	-.406 (.305)	-1.482+ (.764)	-1.096*** (.300)
= 10 次以上	-.125 (.321)	-.294 (.314)		-.807+ (.477)
= 记不清了	-.290 (.212)	-.649** (.248)	-2.175** (.764)	-1.454*** (.232)
教育 = 高中、中专或技校	-.288 (.274)	.068 (.873)		-.533 (.629)
= 大专或者高职	-.334 (.248)	-.423 (.825)		-.429+ (.221)
= 大学本科及以上	-.435+ (.249)	-.122 (.817)		
年龄	.231*** (.057)	.196** (.059)		-.306*** (.080)
年龄平方/100	-.221** (.068)	-.176* (.070)		.395*** (.101)
政治面貌 = 团员	-.128 (.235)	.262 (.334)		-.302 (.249)
=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135 (.278)	-.049 (.524)		
= 群众	.035 (.160)	.051 (.187)		-.268 (.412)

① 由于捐助者调查中部分体制一动员类型样本点过少 根据公众调查相应结果进行加权处理。经检验,该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由于异方差不影响估计的回归系数估计的无偏性,这里不再进一步处理。

② 由于捐助人调查中体制外一单位动员类型样本过少,不满足基本统计需要,即使加权仍如此,因此这里只用捐款次数和收入水平对因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以供参照。

续表 3

	体制外 非单位动员	体制内 非单位动员	体制外 单位动员	体制内 单位动员
收入 = 无收入	2.366 *** (.650)			
= 1001 - 2000 元	1.962 *** (.591)	.375 (.606)		.403 (.337)
= 2001 - 3000 元	2.290 *** (.565)	.849 (.597)	2.250 ** (.715)	-.495 (.347)
= 3001 - 4000 元	2.193 *** (.577)	1.345* (.602)	1.099 (1.125)	.323 (.376)
= 4001 - 7000 元	2.987 *** (.564)	1.776 ** (.600)	1.099 (.825)	
= 7000 元及以上	3.424 *** (.557)	2.604 *** (.627)	3.401 ** (.986)	-.908 (.625)
常数项	-134.310* (68.124)	-5.128 (11.805)	7.291 *** (1.011)	499.963 ** (181.336)
N	393	259	31	112
F (df)	10.0 (22, 370) ***	7.1 (21, 237) ***	9.4 (7, 23) ***	8.1 (18, 93) ***
R-Square	.373	.385	.741	.612
Adj. R-Square	.335	.331	.663	.537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六、结论与讨论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构成理解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背景。我们对希望工程中的“准组织化动员”和“行政化参与”的讨论是以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后总体性社会”(孙立平,1994)形成的讨论作为基础的。在这种“后总体性社会”中,行政力量仍然是一种辐射力和穿透力极强的资源,对其他资源的流动和转化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

从 1999 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又经历了十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带来了单位体制的松动,个人对工作单位的依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改

变(刘平等 2008)。非国有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也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同时,在这十年中,公益事业发展迅速,公益事业运作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大众的公益参与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构性特征,这正是本文重点考虑的问题。

通过对希望工程 20 周年社会影响力评估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体制内外的公众在公益事业参与模式上存在着系统性差异。相对而言,体制内群体由于受到单位动员的机会更多,捐助次数较多,属于“次数取胜”、“积少成多”的类型;与体制内群体相比,体制外的群体单次捐助额度较高,捐助次数较少,属于“额度优先”、“一步到位”的类型。颇具意味的是,虽然体制内外公众公益参与的具体模式有所不同,但就捐赠总额而言却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谓“殊途同归”。<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体制内,组织动员因素对于个体的公益参与行为的作用十分微妙。表面上看,与体制外相比较,体制内组织动员的作用主要体现于捐助的次数;对于个体的捐助总额并没有显著效果,甚至对于单次捐助额度有负面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体制内的组织动员对个体的捐助行为是“无效”的。

然而,这也许恰恰体现了后单位制时代大众动员所具有的“杂合性”的特点:一方面,尽管单位体制有所弱化,但动员力量保持着显著的效力;<sup>②</sup>另一方面,体制外空间获得了初步成长,但自主性仍受到很大约束。正是这样一种格局,构成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与社会背景。目前公益事业成长迅速,但存在的官方色彩过重、“压力捐赠”等问题,与此密切相关。不过基于体制内外差异的比较,乐观地讲,如果把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看作一个随着市场化进程社会自主空间不断扩张的过程,那么,可以期待在公益事业发展中,动员因素会相对弱化,自主性参与将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当

---

① 关于我国公众公益事业的参与行为,一些研究已经发现了某些模式的存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1999)在希望工程 10 周年的调查中指出,希望工程劝募活动基本上采取“重在参与”、“积少成多”的策略。康晓光等(1997)的调查报告也做出结论,认为希望工程是社会大众“积少成多”式捐款的产物。不过,从本研究来看,在相对意义上,体制内外的公益事业参与行为有所不同,其中的差异恰恰体现出动员机制微妙的制度背景效应。

② 也就是说,单位依然很大程度上构成大众动员的重要组织基础。有关改革以来单位制演变趋势的探讨,参见孙立平等(1994)、边燕杰等(1996)、李汉林(2008)、刘平等(2008)的相关研究。

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仅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利用既有数据,对当代中国城市居民公益行为做了进一步探索,关注的只是个体层面捐助行为的取向。<sup>①</sup>由于数据所限,并没有涉及社区动员等问题。此外,以量化方式充分地分析当代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中动员与参与的具体机制(包括内生和外生效应),也还有待于更为系统深入的调查。

### 参考文献:

- 贝克尔,1995,《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边燕杰、约翰·罗根、卢汉龙、潘允康、关颖,1996,《“单位制”与住房商品化》,《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郭健,2009,《社会捐赠及其税收激励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何光喜,2002,《被动的自愿:作为社会参与的慈善捐赠——对四城市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多因素分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康晓光,1997,《创造希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桂林:漓江出版社。
- 康晓光等,1997,《希望工程调查报告》,桂林:漓江出版社。
- 李汉林,2008,《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社会》第3期。
- 李汉林、李路路,1999,《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秋季卷。
-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2008,《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能,2004,《中国都市地区普通公众参加社会捐助活动的意愿和行为取向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路风,1989,《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9,《2009年上半年全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中国慈善信息平台([http://www.donation.gov.cn:8080/sites/2009Analysis/list\\_page.jsp?ColumnID=456&TID=20090728142703265579206](http://www.donation.gov.cn:8080/sites/2009Analysis/list_page.jsp?ColumnID=456&TID=20090728142703265579206)),2010年1月6日查阅。
- 孙立平,1994,《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

---

① 当然,从宏观层面来讲,动员会提高捐助行为的参与率。中国青年报社会调中心的公众调查中,体制内外个体比例分别为43.1%和57.9%。在捐款者构成中,体制内占51.2%,体制外占48.8%。换算为捐款率来看,体制内为75.8%,体制外为54.7%。体制外低于体制内。虽然体制内捐款率较高,但较之于非单位动员,在属于单位动员的情况下,体制内捐款率增加27.4%,体制外增加47.0%。也就是说,体制外对动员呈现较高的“弹性”。

- 孙立平、晋军、何江穗、毕向阳,1999,《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1994,《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杨团,2009,《导论:中国慈善事业的伟大复兴》,载杨团、葛道顺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团、葛道顺主编,2009,《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1999,《捐款是怎样花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报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9,《“希望工程品牌影响力评估”报告发布》,《公益时报》,11月9日。
-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9,《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8年度工作报告书》,中国社会组网基金会信息公布专栏(<http://www.chinanpo.gov.cn/npowork/dc/showBulletin.do?id=3500&dictionid=102&websitId=1000001&netTypeId=2#>)2009年12月18日查阅。
- 资中筠,2003,《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Andreoni, James 1990, “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 to Public Goods: A Theory of ‘Warm Glow’ Gi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100(401).
- 2006, “Philanthropy.” In Serge-Christophe Kolm & Jean Ythier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Giving, Altruism and Reciprocity*, Volume 2. North Holland: Elsevier B. V.
- Andreoni, James & John Scholz 1998,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haritable Giving with 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 *Economic Inquiry* 36.
- Andreoni, James & Rachel Croson 2008, “Partners versus Strangers: Random Rematching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Results* 1.
- Auten, Gerald, Holger Sieg & Charles T. Clotfelter 2002, “Charitable Giving, Income, and Taxes: An Analysis of Panel Dat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1).
- Bekkers, René & Pamala Wiepking 2007, “Understanding Philanthropy: A Review of 50 Years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015507>
- Bernstein, Thomas 1967,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zation Campaigns of 1929–30 and 1955–56: A 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31.
- Brooks, Arthu 2007, “Income Tax Policy and Charitable Giving.” In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6(3).
- Carman, Katherine 2004, “Social Influences and the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Evidence from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in the Workplace.”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http://www.rwj.harvard.edu/scholarsmaterials/carman/Social Influences Designation.pdf](http://www.rwj.harvard.edu/scholarsmaterials/carman/Social%20Influences%20Designation.pdf)).
- Chaudhuri, Ananish, Sara Graziano & Pushkar Maitra 2006, “Social Learning and Norms in a Public Goods Experiment with Inter-Generational Advi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2).
- Delgado, Mauricio & James Dilmore 2008, “Social and Emotional Influences on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Brain.”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 Technology* 9(2).
- Dijk, Frans, Joep Sonnemans & Frans Winden 2002, “Social Ties in a Public Good Experiment.”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5.
- Drollinger ,Tanya 1997, “A Multidisciplinary Model of Monetary Dona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PHD Dissertation of Purdue University ,USA.
- Duncan ,Brian 1999, “Modeling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of Time and Mone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2.
- Frank ,Robert 1996, “Motivation , Cognition and Charitable Giving.” In Jerome Schneewind ( ed. ) , *Giving Western Ideas of Philanthrop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Richard 1997, “Working for Nothing: The Supply of Volunteer Lab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5(1) ,Part 2: Essays in Honor of Yoram Ben-Porath.
- Frey ,Bruno & Stephan Meier 2004, “Social Comparison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esting ‘Conditional Cooperation’ in a Field Experi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5) .
- Gruber ,Jonathan 2004, “Pay or Pray? The Impact of Charitable Subsidies on Religious Attend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 Halfpenny ,Peter 1999,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 Complementary or Contradictory?” In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0(3) .
- Harbaugh ,William 1998a, “The Prestige Motive for Making Charitable Transf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2) .
- 1998b, “What do Donations Buy? A Model of Philanthropy Based on Prestige and Warm Glow.”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
- Howe ,Fisher 1985,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Fund Rais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1(2) .
- Huntington ,Samuel & Joan Nelson 1976 ,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saac ,R. Mark & James Walker 1988, “Communication and Free Riding Behavior: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Economic Inquiry* 26(2) .
- Jones ,Andrew & John Posnett 1991, “Charitable Donations by UK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the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Applied Economics* 23(2) .
- 1993, “The Economics of Charity.” In Nicholas Barr & David Whynes ( eds. ) , *Current Issues in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 Keating ,Barry ,Robert Pitts & David Appel 1981, “United Way Contributions: Coercion , Charity or Economic Self-Interes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7( 3) .
- Kolm ,Serge-Christophe 2006, “Reciprocity: Its Scope ,Rationales ,and Consequences.” In Serge-Christophe Kolm & Jean Ythier (eds. )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Giving ,Altruism and Reciprocity* 1. North Holland: Elsevier B. V.
- Laffont ,Jean-Jacques 1975, “Macroeconomic Constraints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Kantian Economics.”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42 ,No. 168.
- Ledyard ,John 1995, “Public Goods: 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John Kagel & Alvin Roth (eds. ) ,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ong ,Scott & Jeremy Freese 2006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College Station ,TX: Stata Press.
- Long ,Stephen 1976, “Social Pressure and Contributions to Health Charities.” *Public Choice* 28.
- Manski ,Charles 1993, “Identification of Endogenous Social Effects: The Reflection Probl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3).
- Mayr ,Ulrich ,William Harbaugh & Dharol Tankersley 2009 , “Neuroeconomics of Charitable Giving and Philanthropy.” In P. W. Glimcher , C. F. Camerer , E. Fehr & R. A. Poldrack ( eds. ) ,*Neuroeconomics: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Brain*. San Diego ,CA: Elsevier Inc.
- McAdam ,Doug & Ronnelle Paulsen 1993,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 Mesch ,Debra ,Patrick Rooney ,Kathryn Steinberg & Brain Denton 2006, “The Effects of Race , Gender , and Marital Status on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in Indiana.”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5.
- Michaud ,Alice 1993, “Distinguishing Non-Donors From Donor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haritable Giving in Canada.” Master Thesis of Concordia University ,Canada.
- Mixer ,Joseph 1993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 Fundraising: Usefel Foundations for Successful Practi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Nee ,Victor ,1998, “Sourc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Many Briton & Victor Nee ( eds. ) ,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Russell Sage-Foundation.
- Olson ,Daniel & David Caddell 1994, “Generous Congregations ,Generous Givers: Congregational Contexts and Stimulate Individual Giving.”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36 (2).
- Panas ,Jerold 2005 ,*Mega Gifts: Who Gives Them , Who Gets Them*. Chicago ,Illinois: Emerson & Church.
- Piliavin ,Jane & Hong-Wen Charng 1990, “Altruism: A Review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 Prince ,Russ & Karen File 1994 ,*The Seven Faces of Philanthropy: A New Approach to Cultivating Major Dono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Randolph ,William 1995, “Dynamic Income ,Progressive Taxes ,and the Timing of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 Schaff ,Terry & Doug Schaff 1999 ,*The Fundraising Planner: A Working Model for Raising the Dollars You Ne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Inc.
- Schervish ,Paul & John Havens 1997,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haritable Giving: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8(3).
- Schervish ,Paul 1997, “Inclination ,Obligation , and Association: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Learn about Donor Motivation.” In Dwight D. Burlingame ,*Critical Issues in Fund Raising*.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Schokkaert ,Erik 2006,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ransfer Motives.” In Serge-Christophe Kolm & Jean Ythier( eds. )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Giving ,Altruism and Reciprocity* , Volume 1. North Holland: Elsevier B. V.

- Sen , Amartya 1977,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
- Shang , Jen & Rachel Croson 2009,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The Impact of Social Information on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9 (540).
- Smith , Vincent , Michael Kehoe & Mary Cremer 1995, “The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Altruism and Voluntary Giv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8.
- Soetevent , Adriaan & Peter Kooreman 2007, “A Discrete-choice Model with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High School Teen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2.
- Sokolowski , Wojciech 1996, “Show Me the Way to the Next Worthy Deed: Towards a Microstructural Theory of Volunteering and Giving.” *Voluntas* 7.
- Steinberg , Richard 1990, “Taxes and Giving: New Findings.” *Voluntas* 1.
- 1997, “Overall Evaluation of Economic Theories.” *Voluntas* 8.
- Sugden , Robert 1982, “On the Economics of Philanthropy.” *Economic Journal* 92.
- 1984, “Reciprocity: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through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94 (376) (Dec. ).
- Wang , Lili & Elizabeth Graddy 2008, “Social Capital , Volunteering , and Charitable Giving.” *Voluntas* 19.
- Walder , Andrew 1986 ,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son , John 2000,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 Yokum , David & Filippo Rossi 2009, “A Neuroeconomic Perspective on Charitable Giving.”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10.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毕向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晋军)  
中国青年报社(马明洁)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何江穗)  
责任编辑:罗琳

decomposition by groupings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income inequalities during these 20 years , and to test several assumptions in relation to important and relevant arguments popular in China. Then , in order to test a comprehensive hypothes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 the paper use the Sharpley-Value decomposition approach based on semi-logarithmic linear regression to estim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factors to the total income inequality. Putting the factors into a united model of decomposition , the factors having important effects on income inequalities are found in the analysis of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causes of income inequalities are very complicated in China , among which the mechanisms of economic marketization play main roles , meanwhile , the structural-institutional factors irrelevant to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also have important effects;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other factors mix effects of marketization mechanisms and non-marketization mechanisms together.

Government Credit as Signal: Information mechanism of private depository institution in Wenzhou and Taizhou after reform .....  
 ..... *Zhang Xiang* 116

**Abstract:** Why the private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idn't develop as successful as other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How do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regulation policies influence the private depository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after reform? This paper tries to address how the information mechanism , which named "government-credit signaling mechanism" in this paper may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rivate depository institution. Because of high debt ratio , high measurement cost of depository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he limitation of "gossip" mechanism , the reputation mechanism , which relies on repeated games and good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 is very important to depository institution. Facing the strict market access and operation reg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the private bankers have less incentive and more difficulties to invest on reputation. The private bankers may use the supports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signals to attract potential depositors and establish reputation. This government-credit signaling mechanism determines that both the depositors and the private bankers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changes of policies. The data and cases from Wenzhou and Taizhou support the deductions of the above explanations.

The Reach of *Danwei* Mobilization: An analysis on urban residents' charitable giving to Project Hope .....  
 ..... *Bi Xiangyang , Jin Jun , Ma Mingjie & He Jiangsui* 149

**Abstract:** Analyzing the data from "The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n Project Hope in Two Decades"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danwei* mobilization on charitable

giv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s of mobilization are significant. Meanwhile, noteworthy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state-related and the non-state-related sectors. The count of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 in the state-related sector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state-related sector, while the average amount of each giving is lower. As a resul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found with the sum of individual giving from the two sectors.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post-*danwei* era are revealed. On the one hand, the mobilization through the state-related system is relatively effective but limi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bilization within the emerging new social space also influences the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 These discussions shed light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har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Farmers' Associations, Contention Mediation and Collective Petitions in Rural China .....

..... *Liu Mingxing, Liu Yongdong, Tao Yu & Tao Ran* 178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past research on farmers' associations and collective petitions, this paper adopt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random-sample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semi-independent associations, namely the recognized organizations not led or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ir mediating function in rural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emi-independent associations with mediation function can prevent large-scale collective petitions in Chinese villages. In contrast, the rural mediation association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no capacity in mitigating the scale or frequency of the collective petitions. On the basis of field work,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is finding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lso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COMMENTARY AND DEBATE**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Employee's Mental Health

..... *Zheng Guanghuai* 201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dicates that many factors have impact on the employee's mental health throughout the workplac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workplace, such as employment duratio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orkplace violence and abuse, psychosocial working conditions,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s. The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manage system constitutes the main dimension. Structure-agency dimension is found in the sociological models on mental health, such as behaviorism, rational choice and social production. Based on these two dimensions, this review tries to construct a